



委员介绍



政府政策制定者

- David Halpern—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政策顾问，通过规范的实验和行为洞察为英国及其他国家政府服务 **2**
- Fitsum Assefa Adela—是一位致力于以整个政府的视角进行内阁级规划和发展的坚定政策制定者 **3**
- Andrew Leigh—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将经济学和法律培训引入公共政策写作和辩论 **4**
- Soledad Quiroz Valenzuela—是一名政府科学顾问，她为区域和全球努力贡献本国经验，提高政府科学建议的质量 **5**



组织领导人

- Asma Al Mannaeei—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公职人员，领导整个卫生系统的质量改进及管理研究与创新工作 **5**
- Modupe Adefeso-Olateju—是一位非政府组织的领导，率先使用公民主导的评估和公私伙伴关系改善儿童教育 **6**



专业人士

- Julian Elliott—是一位临床研究人员，利用技术有效地准备和维护动态证据综合和指南，为决策提供信息 **6**



公民

- Maureen Smith—是一位公民领袖，倡导患者和公民有意义地参与研究并将其用于决策 **7**
- Hadiqa Bashir—是一位年轻的领袖，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环境中倡导女童权利和性别平等 **7**



证据中介

- Julia Belluz—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新闻工作者，严格地报道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挑战，现有的最佳科学告诉了我们什么，以及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8**
- Kerry Albright—是一位永远保持好奇心的国际公职人员，激发对知识决策和系统思考的热情，并帮助了解证据对国际发展的价值 **8**



证据中介和生产者

- Gillian Leng—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主管，领导技术评估和指南机构，支持政府、服务提供商和患者的健康和社会照护决策 **9**



证据生产者

- Jan Minx—是一名以影响力为导向的学者，将创新证据综合方法引入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的国内政策建议和全球科学评估 **9**



政府政策制定者, David Halpern

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政策顾问, 通过规范的实验和行为洞察为英国及其他国家政府服务

对我来说, 关键的收获在于: 1) 相比于卫生部门, 其他部门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追赶”, 才能够在证据的生产、共享和使用的各个方面达到相同水平; 2) 政府需要一个全球机制来联合委托进行证据综合, 这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 也能够让全球公共产品生产者以高质量和及时的证据产品做出回应; 3) 需要在政府和专业机构中建立“吸收能力”。在这些问题上, 我既热忱又有些急不可待。

关于第一点, 我们需要揭露我们在许多领域中证据基础的脆弱性, 但更积极地说, 当我们建立证据基础时, 可能会是什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说明了这一点, 即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进步, 但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这就确立了我们的**第2条建议**: 当有人提出主张时,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注意并询问主张所依据的证据质量及其适用性。要求更好!

谈到第二点, 我们需要“冲洗”政府部门应该知道答案但却不知道的问题, 换句话说, 我们需要确定“建立在沙地上”的政策和实践领域。在英国, 我们在称之为“研究兴趣领域”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当前, 政府部门提出的这些问题有助于形成英国研究和创新的研究资助议程(每年80亿英镑), 这与我们关于使政府证据支持系统更符合目的的**第5条建议**有关。我们还需要一个全球协作机制, 通过生产、综合和分享证据来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将称其为全球协作网(扩展了我们在英国已有的协作网), 但其他国家可能希望为这个协作网起一个不同的名字。全球协作网有助于解决现有证据覆盖范围和质量不均的问题, 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必要的重复, 这是因为每个国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或通过依赖其他国家的投资搭顺风车)。这与我们针对资助者的**第24条建议**有关。

最后一点让我想到了人们认为提供明确政策建议的机构存在的弱点。令人震惊的事实是, 尽管有大量的政策和实践, 我们仍在黑暗中步履蹒跚。可靠的评估很少见。同时政策制定者又容易过度自信。诸如英国关于设计评估的红皮书和如何评价和评估政策、计划和项目的绿皮书在内的技术指南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需要更多符合目标的证据支持人员和合作伙伴、科学顾问和政府咨询机构(**第6至8条建议**), 以及专业机构的相应改进(**第12条建议**)。建设评估能力(例如英国新建立的评估特别小组)在证据构建的启动和利用方面尤其重要。我希望有一天, 能够看到我们选择、定期测试, 并在国际范围内比较高级政策顾问理解和使用证据的能力。证据委员会的报告将这些想法进行了汇总, 并提供了许多如何去做的指导。

“



政府政策制定者, *Fitsum Assefa Adela*

是一位致力于以整个政府的视角进行内阁级规划和发展的坚定政策制定者

作为内阁成员和国内宏观经济团队的主要参与者，肩负着为有效发展规划和政策设计提供最佳建议的重大责任，主要集中于解决社会挑战。这使得我领导的人们既为计划和政策提供基础，也为备选政策建议提供基础。

加入证据委员会，以及于过去三年在决策顶端和复杂的环境中努力制定政策的经历，都为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让我能够再次强调综合与当前问题相关的多种形式证据的必要性。

为了支持在政策制定中使用证据，并监测我们带来的影响，我的团队一直在开发新的监测和评估指标，以更好地追踪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进展。此外，我们也一直在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制定国家多维贫困指数（MPI），以弥合现有贫困衡量标准的空白。虽然全球MPI能够为国际比较奠定基础，但国家MPIs可以提供我们所需的对本地环境的敏感性。

因此，我强烈支持第三章中关于决策和决策者的见解，特别是第3.3节中关于政府政策制定者对证据的需求及其使用证据的环境的观点。我也十分支持第6.2节中提供的关于证据支持系统的见解，它强调了基于地方（国家或次国家）环境的必要性。鉴于在这方面缺乏全球公平，第6.1节中关于全球公共产品和公平分配能力需求的见解也很重要。本报告将有助于指导我们以最佳的方式使用证据正确理解和有效解决社会挑战。

”



政府政策制定者, Andrew Leigh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 将经济学和法律培训引入公共政策写作和辩论

参与本报告的编写和委员之间的讨论改变了我的想法, 即我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我所在的国家需要做些什么, 以及我希望看到多边组织做些什么。

就个人而言, 第4.8节《最佳证据对比其他证据》(best evidence versus other things)是我最喜欢的部分。这里有很多关于如何从“其他证据”中获得更多信息的明智建议, 像我这样的民选官员会定期收到这些建议, 例如一份预印本、一位有意见的专家、一个提供建议的专家小组和一份辖区范围经验综合。几年前, 我写过一本关于随机试验的书。而现在, 在完成本报告后, 我对随机政策评估的必要性更感兴趣。试验的优势之一在于它们很容易向公民解释, 它们帮助我们解决公民对“技术官僚主义”的担忧, 在这种担忧中, 普通民众认为他们会被自己不理解的决策过程欺骗。对政府的信任不仅仅在于做出正确的决策, 而在于做出公民认为正确的决策。

评估不是只与精英有关的问题。证据是为每个人准备的。我们的报告为个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建议。如果你是正在研究有关戒烟或减肥证据的个人, 那么你应该查看证据综合, 而非单一研究。如果你是一名撰写健康相关文章的新闻工作者, 那么你可以成为Cochrane的常客, 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数千个主题相关的精炼证据。对于报道社会政策的媒体, Campbell协作网可以提供同样的服务。我们的报告建议政府在决策中更好地使用证据, 并通过严格的评估建立证据库。国际组织应更多地依赖证据, 世界银行也应该准备一份关于证据使用最佳实践的里程碑式报告。

国际组织在证据的使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报告采用了非常严格的方法对有关全球变暖及其后果的证据进行筛选和分级。其他全球机构在证据的使用方面系统性较差, 也较常依赖于单一的研究, 且当存在大量同行评审文献时仅引用专家意见, 或是在差别很大的环境下推断证据。这并非是国际机构想要歪曲科学问题, 他们反而热衷于改进, 外部专家可以基于各个机构所公布的如何使用证据决策对报告进行评估, 从而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正如第5.5节所述, 从2007年开始, “点名羞辱”对世界卫生组织(WHO)使用证据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联合国系统的其他部门也需要效仿WHO的领导。

在慈善组织中,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高质量的评估可以创建一个良性循环: 让无效的项目逐渐减少, 有效的项目扩大规模。快速发展的有效利他主义运动要求慈善机构为其影响力提供严格的证据。例如, 据GiveWell.org估计, 对于两个一流的慈善机构(抗疟疾基金会和疟疾联盟), 其项目每增加4500美元, 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这是捐助者支持这些慈善机构的强大动力。更多来自其他慈善机构直接影响的证据可能有助于推动良性竞争和发展。

“



政府政策制定者, *Soledad Quiroz Valenzuela*

是一名政府科学顾问，她为区域和全球努力贡献本国经验，提高政府科学建议的质量

我的一些委员同事专注于改进已经存在的东西，但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我们还没有关键的基础来使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一些政府没有咨询机构，所以我们需要从建立咨询机构开始。大多数政府缺乏接受过如何在工作中常规使用证据培训的工作人员。我不认为只有拉丁美洲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在担任国际政府科学咨询协作网（INGSA）政策副总裁期间，我从其他地区的同事那里听到了类似的描述，像INGSA这样的协作网可以在展示适用于其环境的证据支持系统的相关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



组织领导, *Asma Al Mannaei*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公职人员，领导整个卫生系统的质量改进及管理研究与创新工作

我在一个快节奏的环境中工作，必须基于最佳的证据做出决策，证据最好以能直接递交给忙碌高管的形式呈现。因此，在这份证据委员会报告中，能够帮助我们当局开发在阿布扎比所需的各类超快速证据支持系统的内容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示例包括第2.4节（优先解决挑战的方法示例，尤其是关于COVID-19知识决策协作网（COVID-END）方法的最后一列）、第4.7节（动态证据产品，尤其是我们可以不断回顾的动态证据综合）、第5.3节（证据中介使用的策略，尤其是快速证据服务）以及第6.2节（公平分配能力，尤其是我们的内部流程如何更好地与规范和指南、技术支持和全球公共产品相结合）。如果我们能够创造更能满足当前需求的“胜利”，那么我希望我们可以引入在多个时间范围内工作的需求。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更好地预测挑战并帮助建立本地证据库，同时，我们还可以了解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我们地区和全球的经验教训。

”



组织领导, *Modupe Adefeso-Olateju*

是一位非政府组织的领导, 率先使用公民主导的评估和公私伙伴关系改善儿童教育

我们必须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改进教育决策者的证据支持系统, 包括政府政策制定者、学校董事会官员、校长、教师和家长。我全心全意地接受第6.2节中关于证据支持系统的看法, 它指出, 该系统需要基于对当地环境(包括时间限制)的理解, 以需求为导向, 并专注于以公平敏感的方式将既定决策的证据背景化。通过证据委员会,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补充来自尼日利亚当地教育证据的知识, 包括我们实施的公民主导的评估, 以及尼日利亚特有的其他形式的证据, 以及区域和全球的最佳证据。我了解到英国教育捐助基金会的证据资源和美国教育部的有效教育策略资料中心, 并且可以立即看到在尼日利亚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启动的类似服务的价值。需要加强和支持ESSA非洲教育研究数据库等数据库, 使其发挥的效用更大。我们需要为此努力。

“



专业人士, *Julian Elliott*

是一位临床研究人员, 利用技术有效地准备和维护动态证据综合和指南, 为决策提供信息

结束与证据委员会的工作后, 我更加坚信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方法, 使其将目前进行顺利的COVID-19证据响应工作的许多方面系统化, 并解决许多进展不佳的问题。这包括许多为建立动态证据项目所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项目在COVID-19之外被采用。目前在临床研究以及“平台试验”广泛而成功的实施, 以及预印版采用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令人沮丧的是, 我注意到关键问题的覆盖情况仍不均衡, 特别是与非药物干预(例如行为、环境、社会和系统干预)有关的高质量研究的资助情况水平低得不合情理, 质量低下和过时的证据综合, 以及令人心碎的研究重复所带来的浪费。

”



公民 **Maureen Smith** 是一位公民领袖，倡导患者和公民有意义地参与研究并将其用于决策



公民 **Hadiqa Bashir** 是一位年轻的领袖，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倡导女童权利和性别平等

作为为证据委员会做出贡献的三位“公民”中的两位，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需要对公民如何参与证据的生产、共享和使用以应对社会挑战提出更高的期望。我们的公民专员Daniel Iberê Alves da Silva将他作为年轻原住民领袖的经验写入了第4.10节（原住民权益和认知方式）。我们需要确保原住民控制他们的数据，并尊重原住民学习和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这里，Maureen借鉴了她在研究中作为长期“患者合作伙伴”的经验，以及最近作为COVID-END公民领导者参与COVID-19证据综合的经验。而Hadiqa则借此为她在巴基斯坦的宣传工作提供证据。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向公民传达证据尤为具有挑战性，原因有很多：

- 做出了许多关于公共卫生措施、临床管理、卫生系统安排以及经济和社会响应的决策，并发布了许多指南。随着疫情的发展和证据的积累，这些决策和指南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调整，但通常并没有对为什么做出改变提供充分的解释。
- 生产了多种形式的证据，大量证据及参差不齐的质量所产生的“噪音”存在重大的问题，这往往使得公民质疑他们的决策依赖于哪些证据。
- 来自不同群体和环境的公民及公民领袖通常不参与证据的生产和分享，而由此得到的证据并没有对许多公民产生影响。
- 许多新闻和社交媒体平台主动或被动地促成了错误信息的传播（如第4.11节所述）。

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提高我们的规则水平”，让公民参与到证据的产生、共享和使用中，以应对社会挑战。实现这些目标和培养全社会证据文化的关键是，以公民易于理解和相关的方式了解和获取证据，以及确定什么是可靠证据的能力。我们已经通过COVID-END证明，不同的公民群体能够在1到10天的时间内有意义地参与快速证据综合的准备，每周或每月定期更新动态指南，以及准备证据综合和指南的简明语言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证据产品可以像研究人员的证据产品一样，成为公民的证据产品。我们已经看到，公民领袖是关键的中间人，应该积极参与到社区的证据共享。有人提醒我们，公民本身就是决策者，他们的证据需求应该被满足，就像政府政策制定者的需求得到满足一样。

有意义的公民参与必须支持为解决所有社会挑战而做的努力。这场大流行加剧了一些“影子大流行”，例如基于性别的暴力、对政府越来越不信任、种族和社会不平等以及更多。如果我们要找到这些社会挑战的根源，就需要为公民在证据生产过程和政策变革举措中有意义的参与和领导创造空间。

证据委员会对全球委员会进行分析发现，公民在各项工作中的参与度不高。公民很少成为目标受众、委员会成员和广泛参与的焦点。公民需要公平地参与到前进道路的规划中，以利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

”



证据中介, *Julia Belluz*

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新闻工作者，严格地报道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挑战，现有的最佳科学告诉了我们什么，以及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COVID-19大流行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个充满挑战和令人迷失方向的时期，包括对我们所有试图理解和了解最新证据的人而言，我们想知道有关该病毒的信息以及如何保护我们的家庭、社区和国家安全。在瞬息万变的信息环境中，我们不断挑战和更新假设，理解新的研究或政策带来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但好消息是，COVID-19也加速了全球推动开发和改进工具的进程，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人们在特定环境/情景下批判性考虑证据。我特别想到了证据综合和动态证据产品，本报告的第4.4节和4.7节对其进行了讨论。它们存在的理由在于汇集有关重要社会、政策和临床问题的最新和最佳证据，以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例如，COVID-END 数据库收录了各种高质量证据，从各类疫苗如何对抗新的冠状病毒变异株，到学校停课对最大限度地降低爆发风险的影响（更多示例见第4.12节）。这些工具理应成为新闻工作者报道此次大流行、下一次大流行和许多其他即将到来的社会挑战的重要资源。对于那些接受临床医生、公职人员和民选官员决策的人来说，这些工具也有可能挽救生命。我只希望这场大流行最终能帮助更多的人发现这些工具的价值并使用它们。

“



证据中介, *Kerry Albright*

是一位永远保持好奇心的国际公职人员，激发对知证决策和系统思考的热情，并帮助了解证据对国际发展的价值

我想对我们在使用证据解决社会挑战方面共同取得的多次成功表示庆祝，无论是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还是疫情期间，并鼓励我们所有人现在加倍努力，将目前进展顺利的事情制度化，并在其他领域做出改进。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在联合国系统的不同部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支持成员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决策者使用证据、在联合国规范性指南和技术支持中使用证据，以及充分利用与全球公共产品生产者的伙伴关系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第五章和第六章中众多部分的主题。

在证据提供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两点。首先，研究人员在促进单一研究（通常是他们自己的研究，影响的案例研究通常与增加的大学资金相关）和促进证据体系（包括“竞争对手”的工作）之间存在矛盾。正如我们在第22和23条建议中所述，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学术机构和期刊创造的激励措施，以确保未来我们支持对证据体和开放科学的关注。其次，对于证据中介来说，在区分不同形式的证据和寻找能够捕获更全面方法的语言之间存在矛盾。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实施研究的定义，该定义涉及由决策者共同领导的证据生成和使用，并融入决策的所有步骤（不仅仅是第4.2节中的步骤3），包括纳入适应性规划，并结合第5.4节中描述的各类互补系统和政治分析，以及我所说的更广泛的情景分析。这种情境分析包括对文化、关系和权力差异的分析，还可以利用诸如情境分析、社交网络分析和权力分析等工具。

”



证据中介和生产者, *Gillian Leng*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主管，领导技术评估和指南机构，支持政府、服务提供商和患者的健康和社会照护决策

英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鼓励证据综合和使用的有关工作，从第一个预防海员坏血病的随机对照试验，到最近新提出的促进证据在一系列政策领域使用的“*What Works*中心”。作为这次循证运动的一部分，在过去20年间，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改变了证据在医疗实践以及更广泛的公共卫生举措和社会照护中的使用。

COVID-19大流行极大地增强了需要高质量证据为政策和实践提供信息的必要性，还突出了社交媒体和相关错误信息的负面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证据委员会应对社会挑战的工作非常重要，应该被视为世界各地所有政策制定者的必备读物。

”



证据生产者, *Jan Minx*

是一名以影响力为导向的学者，将创新证据综合方法引入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的国内政策建议和全球科学评估

我正在研究两种形式证据之间的接口：1) 证据综合，这是一种向过去取经的方法，被广泛用于卫生部门；2) 建模，旨在预测未来，并广泛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我强烈支持第19条建议，即我们需要向其他部门的证据小组学习。正如我们在该建议中指出的那样，Cochrane开创了许多方法，对探索什么对健康有益的研究进行综合。包括动态证据综合，IPCC也开创了很多方法来模拟人类在很长时间范围内引起的气候变化。Cochrane和IPCC可以相互学习，也可以向他人学习，其他人也可以向他们学习。

”